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丛书主编：陈红民

张祖葵 著

蒋介石

与战时外交研究

(1931—1945)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研究丛书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丛书主编：陈红民

张祖葵 著

蒋介石 与战时外交研究

(1931—1945)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研究(1931—1945) / 张祖堯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8-11033-4

I. ①蒋… II. ①张… III. ①蒋介石(1887—1975)
—人物研究②外交史—研究—中国—1931—1945
IV. ①K827=7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6378 号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研究(1931—1945)

张祖堯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封面设计	回归线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479 千
版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1033-4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总序

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

—

当从编辑处获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稿已通过程序,可以出版的佳音时,觉得是喜从天降,不能自己。此前漫长而无奈的等待,令人沮丧到快要抓狂。

开始酝酿丛书序言,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继而浮现否定的声音:这个题目太大,太感性,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少,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中充其量只能有个很小的位置,绝对担不起这么个大标题。然而,清理思路的过程中,“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这几个字却魂牵梦绕般地不停跳出,挥之不去。思量许久,乃定以此为题。虽然尚未做到,但我们有此追求,将愿景写出自励,悬为未来之鹄的,亦无不可。

况且,中外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虽已相当丰富,精品迭出,然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作为首套系统的学术丛书,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上,一定会有其应得的地位。

二

蒋介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至今仍在,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却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现实对学术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紧要的。我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回顾学术史,制衡蒋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学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为甚。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总体上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2010年初,美国的《世界日报》采访我时,对浙江大学能够建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将主办第一届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惊讶,反复询问原因。我的答复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绝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学在大陆高校系统首次招收一名“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前辈学者在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蒋介石研究的环境仍有不如所愿之处,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是最好的时机。就此而论,我们确比前辈学者幸运太多!

近10多年来,随着大量珍贵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已从“险学”变成“显学”,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引人瞩目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与学者介入其中,海内外史学界已经开过数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初显规模。

三

浙江大学作为蒋介石故乡的大学,其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前辈学者做了开拓性探索。20世纪60年代,杨树标教授曾参与何干之教授领衔的《蒋介石传》写作组的工作,此项目中途夭折,杨教授却矢志不移,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蒋介石传》,引领大陆史学界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为回应时代变化与学术潮流,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秉承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与可持续性的学术理念,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此为海内外首个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进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与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延聘海内外相关领域的30余位学者为客座教授,其中既有张宪文、杨天石、张玉法、蒋永敬、山田辰雄、西村成雄、马若孟(Ramon H. Myers)等知名的资深学者,又有王建朗、陈谦平、吴景平、杨奎松、马振犊、吕芳上、黄克武、裴京汉、家近亮子、川岛真、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圭德(Guido Samarani)、米德(Rana Mitter)等各国各地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有十几位海内外学者先后在中心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中心研究人员广泛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应邀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40余次;应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举行讲座近20次。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是中心推动蒋介石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自2007年以来,中心先后共举办2次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3次蒋介石研究工作坊,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合办国际性学术会议2次。其中,2010年4月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大陆地区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2012年6月,中心联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HSTCC)等单位举办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暨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创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网站(<http://www.ch.zju.edu.cn/jjsandchina/index.php>),为蒋介石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该网站适时发表研究动态,提供学术信息,汇集研究资料,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培养新一代学者对蒋介石研究的兴趣,扶助年轻学者的成长,中心与恒励集团共同推出“恒励集团研究生论文资助计划”,面向海内外,资助以蒋介石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迄今已资助五届,计有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得。获此资助的同学有的毕业后继续从事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小有成就,收入本丛书的几部著作,就是作者在毕业论文基础上改定的。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白手起家,经过五年多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已在学界小有声誉。可以自豪地说,中心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同时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资助。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克夫董事长、张甬江总经理慷慨捐助资金,对中心的各项活动始终予以支持。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对中心的网站曾予以惠助。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教授数次支持中心的学术活动。浙江奉化溪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亦一直对中心的活动鼎力支持资助,双方已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合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蒋介石中心合作,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工作,黄宝忠副总编辑、葛玉丹编辑为丛书的出版投入大量心力与时间。没有他们的惠助,出版进程肯定更加坎坷。

四

出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是中心建立之初就确定的目标

之一。有无高水平的学术丛书,通常是衡量一个学科、一个课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长达50年之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题目,在此之下,可以做的课题很多。如从大的方向分,可以有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政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经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社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军事等;从历史时段上分,可以有蒋介石与北伐战争、蒋介石与国共内战、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蒋介石与台湾、蒋介石与重要历史事件等;从蒋介石个人经历与生活分,可以有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的读书生活、蒋介石的家庭生活、蒋介石与宗教、蒋介石的人际关系、蒋介石的心理分析等。以上只是简单罗列,每个课题下面都还可以细分出子课题,如“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主题之下,又可分蒋介石的国际观、蒋介石与美国、蒋介石与日本、蒋介石与苏联、蒋介石与英国、蒋介石与亚洲小国等课题。如此众多的题目,需要更多的学者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的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已确定列入丛书的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包括蒋介石研究学术史、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蒋介石与战时经济、蒋介石与战时外交、蒋介石与集权政治、蒋介石与青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等。大多数作者是年轻学者,他们大多了解些新的史学理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大量运用扎实的档案资料,做实证研究。这是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关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我们的设想分两步:首先是在未来三年内出版8—10部,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最终是出版20部,确立一个研究体系。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更欢迎有更多的优秀学者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丛书之中。

五

史学研究的过程艰辛而枯燥,而对涉猎蒋介石相关研究的学者来

说,艰辛与枯燥之外,还多了些难与人道的压力与无奈。甘苦自知,点滴在心!

综观学术史,蒋介石相关研究时有曲折。但只要对中华民族有信心,对中国社会一定会进步有信心,就该相信此一研究的价值及前途。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描写溪水在山间曲折行进的诗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是千辛万苦流到山脚前的溪水。我们不避艰难。我们毅然前行。我们坚信学术有正道,学者有良心,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写作之时,电视里正在重播着《中国好声音》,优美的歌声让人动容,百听不厌。我想,学者们的努力伴随时代的进步,蒋介石研究或许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好声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即将出版,欣喜之余,作此短文,简述丛书渊源与进程,权且为序。



2012年11月10日于杭州仿秋斋分号

目 录

绪 论	1
一、战略重心转移	4
二、求援和结盟	5
三、平等共存	7
第一章 困境·理想·目标	10
一、战时内外困境	10
二、蒋介石的外交理想：与大国平等共存	18
三、战时外交目标	20
第二章 权力·体系·实现途径	34
一、从军至政、到外交首脑权力的整合	34
二、战时多元外交体系的构建	38
三、多元外交体系的主要阵容	50
四、对美外交中的重要角色	77
五、夫人外交：宋美龄使美	100
第三章 战略与实施	117
一、历经波折的中苏关系	117

二、转向与美国结盟的努力	138
三、力促其变的英国	160
四、艰难的选择——中、美、英、苏结盟	185
五、拓展外交空间的小国邦交	201
第四章 合作和冲突	223
一、蒋介石调停英、印冲突	223
二、出席开罗会议	272
三、围绕“史迪威事件”的中美较量	299
四、阻止英国霸占香港的外交冲突	354
第五章 战时外交评价	377
一、相对平等局面的开拓	377
二、共存目标的部分实现	398
结 论	411
一、以外交改变国家形势	411
二、国家主权与平等	414
三、不以势弱而不为的外交努力	415
参 考 文 献	424
索 引	441
致 谢	445

绪 论

20 世纪 20 年代末,蒋介石迅速崛起,以最具实力的军人身份逐步取得国民政府最高权力,并由此开始了对外交的掌控。蒋视政权的掌握与外交权的控制同等重要,改变了过往政府首脑不直接参与外交,一任交由外交部去办的历史,从而翻开了“战时外交”由他主导运作的另一篇章。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以蒋介石亲自主导、参与为特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先导,以求援、结盟、抗日、与大国平等共存为主要线索,展开了在国际间灵活、积极的外交活动。蒋凭借掌握党、政、军无人能及的雄厚政治资源,直接任命特使、密使,派遣夫人使美,拓展了战时外交渠道、路径与空间。从决定国家外交战略及走向,到具体主导、参与,无疑是国民党实施“训政”背景下蒋介石专制思维在外交上的充分表达。尽管如此,“特殊时期,特殊外交运作方式,特殊外交结果”的“战时外交”,仍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其中既包含了蒋介石从“苦撑待变”到“困境图存”,其战时外交目标的递进与重心的转移,又囊括了他对实现泛太平洋地区抗日军事同盟,以及发起与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等结果的渴求。显而易见,取得抗战的胜利,促使中国确立大国地位,无疑是蒋在抗战时期外交上最为重要的主题。

长期以来,外交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家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与理性的行为。但如果仅仅把“外交”看成是“由外部因素驱

使”,或是内部“国家集体、理性因素”所致,则容易忽视“政府首脑个体对外交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将私人和公共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①的运作方式,则更值得学界探研。为此,本书以“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两大因素为基点,拟从蒋在战时外交的“困境——理想——目标——结果”的角度出发重新系统审视,以期阐明“首脑”思维与“战时外交”之间的紧密联系。

蒋介石与对此始终保持距离的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首脑均不相同,他对外交充满热情。早在1928年12月10日,他就已明确指出:“北伐完成以后,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外交”^②;后又强调:“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及“外交重于政略,政略重于军略”,其方针应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③。与此同时,他对过往政府深为倚重的职业外交人员却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认为“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自居卑下,甚至委曲求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的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④。其对职业外交人员的恶感与近代中国的掌权者们一贯的依赖态度大有区别,无异于对传统外交体制的否定。

蒋介石坚称“外交必须适应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⑤,并把外交提到重于政略、军略的高度。在蒋的心目中,中国外交的被动和软弱,很大程度上和职业外交人员的“自居卑下”、“枉屈自全”不无关联,与僵化的体制则互为因果。因此,随着蒋权力的上升和巩固,他便逐步对并不适应其政治诉求的外交体制实施改造,进行外交权力的收归和整合,转而

①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期,第34页。

②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1928年12月10日),载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第165页。

③ 《蒋中正讲述》,载《总裁外交言论选辑》,黄埔出版社,1941年,第13页。

④ 《外交人员的修养》,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467—469页。

⑤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战史料丛编初辑》,1974年,第143页。

由他亲自掌控、左右政府外交,并乐于以“首脑外交”(他所信赖的特使、密使、夫人外交和他自己)的方式加以运作。

关于“首脑外交”一词,美国学者埃尔默·普利施科将其定义为是将“权力、职能与其正式身份直接参加的、最高政治级别上的外交实践联系起来”,“除了在制订对外政策上发挥个人领导作用外,他还越来越多致力于同其他世界领袖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交往,任命特使代表他本人活动”。^①这与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颇为相似,对内是政府领导,对外则扮演头号外交家的角色。

回溯漫长的中国历史,天朝帝国曾有过的兴盛,是个八方来贺的时期,帝王只需要在形式上接见各国上贡的使臣,谈不上外交的互动,更遑论发展出完备的外交体系;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交近乎等同于万般无奈的丧权辱国。或高居庙堂之上不谙外交,或幕后决策、垂帘听政,或推诿搪塞对其避而远之的国家首脑们,自然不会走到台前亲自处理纷繁复杂且动辄就扣上“卖国”罪名的外交事务。介于此,几乎所有外事交涉的重权都落到外务大臣(或外交部长)的手中。直到民国初期,也还依旧保持首脑浮于表面,而由外交职能机构具体实施、运作的传统格局。

1912年,时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力图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旨的“革命外交”重塑政府形象。虽已可寻见中国早期首脑尝试参与外交的痕迹,但由于缺乏实力,甚至制度与组织的保证,加之遭遇列强的强烈反对,其单枪匹马的外交努力不得不宣告失败。孙其后的袁世凯,尽管重视、关注外交,甚至还亲自兼任过外交总长,但始终没有跨出幕前亲自操刀的关键一步,与“首脑外交”的评判标准实际还存在相当距离,而继任者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也是如此。以徐世昌等人为例,尽管他们中也有人具有不错的教育背景,并且因为长期与袁世凯合作,完全能够理解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但如顾维钧所言,“他们虽关注此事,但

^① [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缺乏自信,感到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因此将对外事务一任外交部去办”^①。由此可见,基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在蒋介石之前并没有将专制与外交结合衍生出首脑对外交绝对掌控的先例。

1926年后,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蒋介石本人强烈的专制欲望以及他对外交现状抱持的极大提升空间,使专制、权力、热情以“外交”为名微妙地整合到了一起。在其授意之下,国民政府进入“训政”阶段,蒋顺理成章以政府最高决策者的姿态,打破“政府不问外事”的旧习,直接操控外交,使其为国家的政治利益诉求服务,并与之保持一致。蒋同时还以外交人员任用的多元化、外交途径使用的多元化,配合超越常规的运作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国民政府外交的发展,并为开辟抗战时期外交上的新局面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战略重心转移

抗日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蒋介石一度怀揣“中日亲善”^②的迷梦,日本的背信弃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本定位为“东妥”的外交战略重心调整为“西向”。这当中除了蒋无力与日抗衡的迫不得已以外,还包括他对日本侵华真正企图的另一判断,即日本此举并非仅限于对中国的侵略,而旨在吞并和占领整个亚洲,如此一来,就必然损害其他列强在亚洲的利益,进而与英、美发生冲突。

1938年上半年,蒋介石在此基础之上对包括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在内的未来国际形势变化进行预估,认为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国际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欧美列强一定会介入远东;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

^①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90—393页。

^②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1928年12月10日),载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一册),第518—519页。

行动的国家。^①出于上述考虑,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制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中日问题”的战略方针,从而确立了“西联英美、北接苏联”的战时外交战略。^②

1939年1月,孙科又将蒋介石所要求的“对英、美提出积极运作方案并与苏联保持联络”的外交策略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将“战时外交战略”具体解释为“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③。即便是带有亲苏色彩的孙科,也不可否认英、美已经进入蒋的视野,而国民政府战略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就忍受着“苦撑待变”的煎熬。

二、求援和结盟

对国民政府而言,走向西方的“求援”之路,无疑是艰难而漫长的。先是寻求“国联”主持公道,制裁日本;再是呼吁英、美重视远东战场,给予中国军事、经济援助以阻止日本的侵略,但并未获得英、美等国道义上的同情和实际的物质支持。英、美假意中立,敷衍中国,却千方百计讨好日本以求苟安。他们都想从对日的绥靖乃至妥协政策中,换取日本对各自远东利益的“保护”,而对国民政府的求援,根本不屑一顾。

英国内阁决定的远东政策完全倾向于“对日和解”,既不算对日本实施制裁,又对中国的求援置若罔闻,甚至拒绝中国转向盟军寻求支持。显而易见,英国政府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动机,仍然建立在力图通过此途径维护其远东及在华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并不需要响应国民政府的诉求以秉持国际公理“制裁日本”即可完成。继卢沟桥、上海抗战之后,中日战争局势日益紧张,英首相张伯伦又在下院明确表态:“英国当前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在于避免活跃于远东的敌对行动。”^④

① 参见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 参见蒋永敬:《抗战初期的外交与国联及德使之调停》,《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5集。

③ 孙科:《我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1092页。

④ W. N. Medlicott, Douglas Dakin and others,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X X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4), pp. 788-799, 810-812.

1937年8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向国务卿赫尔建议美国应采取的立场:“(一)避免介入;(二)保护美国在华权益;(三)对交战双方维持友谊,保持中立。”格鲁最后谈到,之所以采取如此政策,就在于一旦结束冲突的“时机来到”,日本将会听从美国的“劝告”。这与赫尔本人的意见极其相似,他因此表示赞同,^①由此基本确立了抗战初期美国的基本立场。

1938年10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致电外务大臣哈里法克斯,主张在“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宁愿承担英国在华利益所遭到的暂时损失”,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今后的时期内“能尽到适当的作用”。11月4日,他又提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筋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②,以获渔翁之利。基于如此考量,1939年7月,英国竟然与日签署出卖中国主权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对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表示充分认定,并声称“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或措施”^③。《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使国民政府自此对英外交基本不抱希望,唯有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将英国卷入对日战争。

而与英国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欧战爆发以后渐趋积极,但仍奉行“先欧后亚”的方针,对中国的援助仅限于“使中国维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状态。他们认为,“保持现状”本身就是对日本的最大牵制。美国人的意图亦很明显,是要把战火堵在中国本土,而不致引火烧身,更不致伤及其远东利益为限。

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此后,日本同时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英、荷两国在东南亚的属地,而此时的美国却还正在谋求与日本的妥协谈判。11月26日,形势剧变,日本“最后

^① Joseph C. Grew, *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 (1904—1945)*, N. Y., the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p. 1117.

^②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Third Series, Vol. VIII*, H. M. Stationery Off., 1978, p. 162.

^③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三辑第九卷),第333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2页。